

日本漢學家白川靜金文研究及其影響*

黃庭頌**

摘要

白川靜是日本漢學界重要的古文字及古代史研究大家。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及前人著作的啟發，白川靜有系統地展開金文研究，並從歷史學及考古學角度切入，推進了金文研究的層次。在白川靜金文研究中，其實包含古文字考釋、斷代編年研究、上古史研究、民俗學研究等跨領域學科，展現日本漢學家博通的一面。本文主要回顧白川靜金文研究的成果及影響，針對兩部重要金文著作進行介紹，並分析日本漢學界及古文字學界的觀點與反省，希望藉此展現其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首先介紹白川靜的生平歷程，並回顧中文學圈相關金文著作的譯介與研究。其次概論《金文通釋》研究特色及影響，主要從體例安排、方法論建構、金文史料化及古文字考釋等方面進行分析。其三介紹《金文的世界》寫作特色及成果，討論本書的編年斷代，以及金文作為史料的特點及侷限。其四回顧白川靜金文研究的影響與反思，以上古史著作及論文為考察範圍，以此突顯日本漢學界與古文字學界對其研究的評價與定位。最後針對白川靜文字學研究值得開展的課題，提出幾點展望與

思考。

關鍵字：白川靜、金文、古文字、金文通釋、金文的世界

壹、前言

金石學是一門始於漢代，發達於宋代與清代的學問。主要是研究青銅器或石刻上的文字，或涉及甲骨、玉器、陶片、磚瓦等文物。不過李學勤指出，二十世紀30年代開始，青銅器研究受到國際的影響，開始從形制、紋飾方面出發，並以類型學方法進行研究，此後形成兩種研究途徑。一種是從金石學走向考古學，另一種則是從類型學走向考古學，而將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並建立一套系統的學者是50年代的陳夢家，而之後，還能系統性研究青銅器的學者主要有兩家，一位偏於金文，一位偏於器物類型學，前一位是白川靜，另一位是林巴奈夫⁽¹⁾。由此可知，日本漢學家對金文研究之推動，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白川靜(1910—2006)是日本古文字與上古史研究的大家，尤其金文研究更是卓然有成。其1910年生於日本福井縣，立命館大

學法文學部漢文學科畢業後，便留任立命館大學專門部教授，退休後任文學部特別任用教授，1981年獲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的稱號，並於2006年10月30日逝世，畢生專心著述，生活簡單樸素。白川靜最早的學術關懷為中國古代文化，並企圖從民俗學的觀點對《萬葉集》與《詩經》進行比較研究²。至於甲骨、金文方面的古文字學研究，則是擔任立命館大學教授後才真正展開。換言之，金文研究只是白川靜研究的一部分，其終極的學術關心乃是通過民俗學方法認識中國古代文化與生活。

白川靜的金文研究成果主要見於《金文通釋》，此書使之成為與郭沫若、陳夢家、唐蘭並駕齊驅的重要學者。其後又撰寫《金文的世界》，是首部主要利用金文材料撰寫殷周社會史的普及讀物，此書不僅令白川靜在金文方面的成果更為全面，也進而影響了一般大眾。除此之外，尚有部分成果散見於《甲骨金文學論叢》、《說文新義》、《字統》、《字訓》、《漢字的世界》等著作，內容均展現一貫學術風格，兼顧古文字學與古代文化的討論。

過往關於白川靜或其金文研究方面的論述並不甚多，其中以中國學者白冰於2007年出版的專著《青銅器銘文——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最為重要，其撰寫動機為「白川靜的金文研究在古文字學界有重要地位，以往學術界對其沒有一個全面系統的總結和認識，國內學術界尤其缺乏全面的了解」³，因此作者針對《金文通釋》、《金文世界》、《說文新義》、《字統》進行「比較客觀的研究」，並且檢討白川靜著作中的得失，此後如劉海宇、蘇冰等人亦陸續發表相關論文⁴。相較之下，臺灣方面雖較早譯介白川靜《金文的世界》、《甲骨文的世界》及《詩經的世界》等書，且持續引進其他中文版著作⁵，但學術界方面卻相對缺乏

系統性的研究或評論⁶。有鑑於此，筆者擬對白川靜古文字學研究進行廣泛性考察，然受時間與篇幅所困，初步鎖定金文研究的部分進行回顧。本文的目的不在對白川靜的研究成果進行批判，而是就其寫作策略、完成情形加以討論，藉此突顯白川靜金文研究的特質，同時開拓東亞漢學視野，補足有關古文字、上古史方面的論述，並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線索。本文將先考察白川靜的專門著作《金文通釋》，其次對其普及性著作《金文的世界》作一概覽介紹，然後討論白川靜金文研究的影響與質疑，最後則提出幾點個人觀察，還望方家批評指正。

貳、《金文通釋》研究特色及其影響

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八月起，白川靜為大阪、神戶等地學者所組成的讀書會「樸社」定期宣講，因此準備了一系列關於金文的例行講稿。這份初稿經過適當改寫後刊印於《白鶴美術館誌》（以下簡稱《館誌》），直至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五月，《白鶴美術館誌》第五十輯已刊登包含〈金文通考〉、〈補釋篇〉等文稿。同年十二月及隔年三月又追加了五十一、五十二輯〈補記篇〉，而五十三至五十六輯則附上〈本文篇〉上下及索引兩篇，總共刊載了五十六輯，並於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三月刊登完畢。

這些登於《館誌》的文稿最終集結為《金文通釋》，回溯本書從最初成形到刊畢一共歷經廿二年時間⁷，這也成為白川靜最重要、最具系統性的金文研究專門著作。《金文通釋》的主要研究特色包括四個部分，分別是體例的安排、方法論的建構、金文史料化以及古文字考釋，基本涵蓋金文學所有可以開展的課題，以下即從各個方面進行說明……

一、體例的安排

《金文通釋》體例嚴明完整，可謂是金文的集大成之作。從文章次序編排來看，白川靜已是有意識地按年代及主題進行分類。例如《館誌》第1輯僅收錄《大豐簋》一器，而此器現被認為是西周武王時期之物，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西周典型器物。白川靜雖將此器定為康王時期，不過仍置於《館誌》第1輯的第一器，顯然是認同《大豐簋》的開創性及歷史意義。又如《館誌》第2期、第3期分別收錄召公、周公相關器物，第2期收錄了《大保卣》、《大保簋》、《束解》、《旅鼎》、《叔隤器》、《樹殘器》、《御正良爵》等器，並附上《大保方鼎》及《成王方鼎》，其共同點為銘文均見「大保」二字。白川靜應該是認為它們都與召公家族有關，並企圖進一步針對召公及其家族的歷史問題展開研究。雖然郭沫若、陳夢家早已提倡此種利用金文所見人名對不同器物進行繫聯的方法，但二人的著作也僅限於考釋銘文時提及及其他相關器物，間或觸及部分歷史議題，並未如《金文通釋》系統整理或加以編排，可謂是在既有基礎上更推進一步的研究方法。白川靜以主題器群的編排方式，不僅更能突顯作者的立場，也可以使閱讀者快速掌握銘文延伸出來的相關論題，對於利用金文材料建構上古歷史產生相當大的助益。

至於各篇說解的體例方面，白川靜也並非僅聚焦於器物銘文的生難字詞考釋或講解，而是對器名、時代、出土地點、收藏過程、器影著錄、諸家考釋、器制、銘文都做了全面整理與目錄，同時附上器物照片及銘文拓本，使閱讀者易於查詢，直至今日仍是資訊最為完備的一部金文著作。其中白川靜花費較多筆墨的是器制及銘文部分，器制方面主要引述學者對於器物形制、紋飾的形容，有時也會根據相關資訊對器物的斷代

再加以說明。銘文部分則採逐句解說方式，通常引用學者的重要觀點並加以辨析，若有不同看法則進一步展開討論，而此部分往往最能展現白川靜的研究成果。

二、方法論的建構

《金文通釋》第41—45輯所收錄的數篇方法論文章，是理解白川靜如何研究金文的主要材料。包括〈金文學史〉、〈考古學的研究の方法〉、〈金文學的研究の方法〉、〈曆法的研究の方法〉、〈西周期的斷代編年〉及〈列國器編年〉，其中〈考古學的研究の方法〉及〈金文學的研究の方法〉二文更是突顯了白川靜研究金文的基本理念與態度。

〈考古學的研究の方法〉是通過文獻檢討的方式，陳述金文研究是如何從彝器學轉向現代考古學，並且針對彝器的分域進行討論^⑤。白川靜在這篇文章中，深刻檢討前人如何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青銅器，並指出「彝器的樣式和其開展、分域的問題，是金文學其中一部分的重要基礎工作」^⑥，同時認為「依據器型、紋飾進行年代判斷的考古學方法，對於無銘青銅器而言是有其必要的」^⑦。此結論從現今眼光來看並不特別，但考慮白川靜發表文章的年代，便不難感受到日本學者對於西方考古學方法的深刻認識及掌握。

〈金文學的研究の方法〉則是主要討論「分期與斷代」及「史料與考釋」兩大課題。白川靜認為確立金文斷代、認識金文以及使之史料化是研究金文最重要的三件事，其中又以確立金文斷代為首。關於金文斷代問題，白川靜除了檢討前輩學者如柯昌濟、郭沫若、容庚、貝塚茂樹等人的理論外，也表明支持「絕對年代標誌法」^⑧的立場，並認為「器

群研究法是作為研究曆譜的輔助手段，才開始產生意義。曆譜的建構，就是研究金文的基礎方法。¹²其不僅認為建構西周曆法是研究金文最重要的基礎工作，更進一步主張將曆法研究方法理論化，提出〈曆法的研究の方法〉一文，並將此理論落實於〈西周期の斷代編年〉及〈列國器編年〉兩篇論文之中。

白川靜是較早著手計算西周曆譜的重要學者，並盡可能地落實計算成果，將寓目所及之青銅器進行分期斷代。不過比起計算西周曆譜的明確追求，白川靜似乎並不勉強算出銅器的絕對年代，其銅器斷代特色在於成立「成康銅器」、「昭穆銅器」以及「懿孝銅器」時期，說明不少銅器只能推測大致的鑄造時期，無法明確落實於特定王世。雖然此種方法使器物斷代較為模糊，但結論少有明顯錯誤，同時也點出器物型態發展未必與政治更迭同步的情況，無疑是較嚴謹慎重的研究態度。

至於「史料與考釋」部分則是通過對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及唐蘭「康宮問題」的檢討，彰顯何為有機的金文研究。白川靜除彙整二位學者所觸及的課題外，有時也會提出自己的觀點。例如《唐蘭的分期斷代和《大系》、《斷代》都有所不同，多將周初的器歸入昭穆時期，原因乃是唐蘭將《令彝》的康宮視為康王之廟。白川靜認為唐蘭不僅誤解了康宮的意思，視《令彝》康宮為成周的康宮也是錯誤的，西周君臣不可能為了冊命廷禮遠赴成周，因此康宮位置必然是在宗周。¹³不難看出，「康宮」問題的討論焦點是如何正確理解「康宮」一詞，並藉此推演銅器斷代，而從這個角度而論，白川靜之所以追求正確的斷代，則是為了解決歷史問題，故其主張從「史料」的眼光看待銘文，進而提出「金文史料化」的概念。

三、金文的史料化

「金文的史料化」是白川靜研究金文主要的努力目標，此部分研究成果見於《館誌》第46、47輯刊登的〈西周史略〉。〈西周史略〉共分六章，分別為殷周之際、周初的經營、羣京辟雍、政治秩序的成立、孝夷期和淮夷的動向、貴族社會的盛衰與西周的滅亡。第一章第一節的開頭，白川靜即以「西周史和金文資料」為題，說明如何運用金文材料寫作西周史，而這段文字正可作為「金文史料化」的主要論述。其指出：

以現今文獻批判的方法來講，周本紀的內容和資料，大多都是經說或巫祝所傳承的二手資料。例如《周本紀》中「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乃是根據書序之說，但在成康時期的金文中，卻顯示出此時期有著周朝規模最大、次數最頻繁的平定作戰。此外，所謂「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也是十二諸侯年表根據三家詩認為《小雅·鹿鳴》有美刺之意而來，但是共懿時期是廷禮冊命金文的完成期，反而可以視為周朝政治秩序的完成時期。如果只侷限於像《周本紀》這類的文獻資料，西周時代的歷史性恐怕會被否定，但是根據目前留存的豐富金文資料，卻可以讓我們再次建構完全不同的西周史。此外通過這樣的再次建構，也必然能使古代史的各種問題逐漸具體化。¹⁴

根據上述引文，可歸納出白川靜追求「金文史料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其認為傳世文獻多是經過輾轉傳述、傳抄的二手資料，內容真實性不明，難以藉此認識西周時代的歷史。其次，經過兩個例子的說明，可以發現

金文所呈現的世界與傳世文獻之描述有巨大不同。基於上述兩點，白川靜選擇使用金文資料重新建構西周歷史，並試圖使古代史的問題逐漸具體化、清晰化。

從〈西周史略〉寫作策略來看，白川靜「金文史料化」目標無疑是成功的。〈西周史略〉的各章都是圍繞數個特定歷史課題展開討論，當中確實存在不少必須運用大量金文材料方能進行的研究。舉例而論，白川靜對西周初年的政治觀點立基於東、西方氏族的交流與融合，因此第一章第三節「東與西」即根據《何尊》銘文內容以及寶雞出土的殷器建構出東、西氏族交流的歷史¹⁵。更具體的展現見於第二章第一節「北方的殷周器」，白川靜認為召公為殷族，乃是卜辭召方的後代，故其根據《大保簋》「王伐象子聖」一事，繫聯所謂的象器、召氏諸器及河北琉璃河出土的燕器，勾勒出一支強而有力的商族，在商周之際獲得姬周信賴，進而參與重要的平定戰役，甚至受封燕國並加以經營北方的史事¹⁶。

儘管從現今的研究成果看來，白川靜的論述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包括召公是否為殷族後裔、象子聖與象器之間可否繫聯，甚或是召氏一族遠封燕國可否視為東、西方氏族合作的代表等課題，目前學界仍未有明確共識，貿然將之書寫成歷史，或許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但若從書寫企圖方面而論，召公作為西周早期重要的政治權責代表，文獻記載又僅鳳毛麟角，遠不如同時期的周公等人，希望利用召公一族所遺留的珍貴青銅器重新建構歷史，以彌補文獻之不足，確實也是學者至今努力不輟的方向，因此雖論述方面略有遺憾，仍無法抹滅此嘗試的重要性。

大抵而言，〈西周史略〉是白川靜落實「金文史料化」的具體成果，其成就在於二處：第一，完整利用金文材料勾勒西周歷史。自郭沫若撰

寫《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及圖錄》以來「金文史料化」就是許多金文學者努力的目標，遺憾的是包括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唐蘭《西周銅器分期斷代史徵》都未能順利完成，特別是缺乏西周晚期的相關研究或論述。因此〈西周史略〉雖然篇幅較短，卻有彌補前人未竟之憾的功勞。第二，體例的創新。雖然在〈西周史略〉以前，金文研究者已展現出利用銘文建構西周史之企圖，然上述著作體例多是延續清儒筆記、札記寫法，且更多地關注文字的釋讀與理解。所謂的「西周史」僅僅是按器物年代早晚排列，缺乏進一步論述或明確的史觀，難以視作嚴謹的歷史書寫。但〈西周史略〉並非如此，白川靜以「述史」為主體，關注周王朝之王權觀、政治經營的策略、與周邊民族的互動等議題，較之前賢更具歷史性的問題意識，也達到白川靜所謂「通過這樣的再次建構，也必然能使古代史各種問題逐漸具體化」的目標。

四、古文字考釋

白川靜的古文字考釋成果主要見於《金文通考》，過往學者對此部分關注較多，且通常是從對錯角度進行評判¹⁷，但本文並不打算做此論斷，而是欲探問：白川靜作為日本的古文字學者，其取徑或見解與中文世界有何不同？

根據《金文通考》體例可知，白川靜考釋銘文的方法，乃是羅列各家說法，再依其判斷援引一家較為合理之說，間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亦即今日所見之「集釋」。在此種取徑之下，大部分銘文的理解都是延續前賢學者看法，真正屬於白川靜自己的創發意見並不甚多，儘管如此，經過詳細的爬梳還是能夠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得以藉此理解白川靜如何

考釋生難銘文。若按其思考理路進行分類，大致可分為兩種途徑：一者是藉由字形或文例對照推測文意，另一者則是從民俗學角度分析文字造型。

首先介紹白川靜的第一種途徑。其於考釋《小臣毚鼎》「𠄎」字時，認為此字右旁與「藉」字所從相同，藉乃是手執耒耜踏足插入土中之形，由於此字從耒耜或耒耜之形，原來應是與園藝有關的字。¹⁸此字後來經裘錫圭考釋確定為「建」字，¹⁹但此處白川靜十分謹慎小心，並沒有立刻對該釋何字進行判斷，只是詳細描述字形結構，並推測文意。有時白川靜也會參考不同的資料或文例，提出自己的文字考釋結論，比如其對《效父簋》「𠄎」字就有很精采的見解：

從「𠄎」之字，在金文中有冰、勻等。《陳逆簋》見「冰月丁亥」，根據《晏子春秋》可知十一月稱為冰月。冰字雖於水旁加「冫」，但無法得知「冫」是否為聲符。因此將本器的「𠄎」直接釋為冰，甚至往同音的棚、葡、簾解釋，似乎過於牽強。金也和此所從之形、冰沒有聲音上的關係。由此看來，恐怕「𠄎」應該是象形字，水的「形」就是指冰，而金也有「形」的形態，因此「𠄎」應是水或金都會形成的某種型態，或許可以直接視為是冰的初文。……不過「冰三」是無法理解的，此「三」字當從金去解釋，視為有關金的字。……金文中「易金」的例子很多，由於這個金應該是經過精製而形成一定形狀，因此從「易金」可以確定其材質、形狀、重量，再從「三」來說，應是表示其賜與的內容。故「𠄎」必須從量詞意義的方向解釋。恐怕「𠄎」無法解釋成冰或簾，而是當時和貝同為當時最常見的賞賜

物「金」，金文有「易金一勻」，勻字也有从「𠄎」的字形。由於一勻當指三十斤，故「勻三」即指「金勻三」，乃是金九十斤之意。²⁰

此處不厭其煩地將其考釋內容逐一摘錄，乃是希望呈現白川靜考釋古文字時審慎思考，旁徵博引的態度。其不僅熟讀其他學者的考釋結論，也能援引古籍或其他金文文例，再對原來考釋的銘文進行判讀，經過多重驗證後，才試圖提出自己的看法。此種思考模式的好處在於，即便結論未必正確，仍能帶領讀者認識這個字所能連結的各種材料，以及其可能開展的所有課題。

另一種途徑的考釋文字方式，則是結合白川靜長期關注的民俗學加以詮釋。他曾希望「從民俗學的觀點，嘗試將古代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點活起來」（杜正勝語），²¹而這方面的嘗試不僅見於詩經研究，也見於對古文字的認識及理解。

例如：白川靜考釋《大保簋》「𠄎」字時，就不同意郭沫若「象狗貼耳而坐之形」的看法，而認為此字下半象人跪坐之形，象徵頭上戴有頭飾的女巫，正在傾聽神意。²²白川氏的看法並非毫無根據，現今已能清楚說明郭沫若的考釋混淆了从羊从口的「苟」及从犬从句的「苟」，「𠄎」確實是象人跪坐之形，只是此人當是臣服的羌人，而非戴有頭飾的女巫。又如，白川靜認為「某」是謀的初文，指出此字从臼从木，臼乃載書之象，於神木之上放置載書表祝告之意，原指訴諸神意、謀於神意之意。²³此說亦是受到民俗學影響的解釋，而不接受傳統字書將「某」解釋為「梅」之本字，再通假成「謀」的說法。類似的狀況尚見於「省」之訓釋，其認為「省」是一種主體的巫祝行為，如望、堅、臨、視等字，

都包含有以眼力、視覺的巫祝意義。視察是有種支配對方、厭勝意味的行為，而此處的「適省」乃指支配該地。⁽²⁴⁾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白川靜對於文字考釋固然有其相當謹慎的一面，同時也有充滿想像力的部分。以現今研究成果來看，某些結論或許不為人所採信，然而若能理解白川靜援引民俗學探討古代社會的研宄目標，則可視作一種新的研究視野或是具個人特色的考釋觀點。

參、《金文的世界》寫作特色及成果

《金文的世界》是白川靜寫於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的通俗性著作，中文譯本則於1984年由蔡哲茂、溫天河翻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不難看出，《金文的世界》是在《西周史略》的基礎上擴寫而成，而白川靜在本書延續了他重要的研究宗旨，亦即「除描述金文概觀之餘，同時盡量把幾近空白的西周史之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提示出資料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依據金文資料重新構成一部西周史的嘗試」。⁽²⁵⁾除此之外，因為這是一本面向大眾的書籍，故不宜忽視其在歷史普及方面的貢獻。

本書除緒論外，正文共十二章，依序處理殷代之金文、周朝之創業、「天下」的世界、禮教文化之成立、南征與遠遊、廷禮與貴族制、土地經濟之發展、「十月之交」前後、共和時代、中興之挫折與崩潰、列國之金文、斷代與編年等課題，同時嘗試利用金文材料回應傳世文獻懸而未決的問題。因此本書討論重心並不僅止於各篇金文的文字考釋或內容，更關注金文學如何在古代史及古代文化上發揮更大功用，且使之確立。既已為本書劃定以金文材料構成西周史的基本方針，首先必須回答至少

三個層次的問題：青銅器的本質與意義是什麼？金文材料為何出現，該如何看待它？中國的青銅器時代與其所開展出的文化象徵什麼意義？

針對上述幾個問題，白川靜於本書《緒論》嘗試提出幾個初步看法，其根據「彝器」的文字結構，指出「彝」作、，象兩翼反剪之形，蓋表取雞血以饗祭器之意。而「器」字，則是从四個表示祝告之器的口之間置一大牲之形，意指送葬所用之明器。由此可知彝器之為物，原本用於神事，奉獻神靈，祈求神意，而具有媒介神之機能。⁽²⁶⁾由於青銅器是連結祖先與祭祖者之間的媒介，兩者是「一種自然而絕對的關係」，因此毋須鑄勒文字以說明作器之由來或目的。

然而白川靜認為殷末銘文的出現，「實意味著已在祖靈與祭祀其祖靈的氏族之間，開始加強媒介的作用來促進王室與氏族間的政治關係。祭祖，變成是依王室與氏族之關係在其政治秩序之下進行了。彝器銘文所以記錄這種事情，乃直接顯示政治的關係已強力地支配了氏族生活。」⁽²⁸⁾更進一步看，「西周期的金文，把世襲貴族社會之繁榮及其崩潰之過程客觀如實地顯示出來。」⁽²⁹⁾換言之，銘文的出現象徵青銅器已非單純連結人神之間的工具，而是產生政治意義，其主要作用在於促進王室與氏族之關係，甚至如實地反映社會與歷史的變遷。

從此角度言，青銅器時代並不單純代表一個從石器到鐵器的過渡期，而是白川靜所指出的「中國的古銅器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之象徵，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有一個足以強調的內容，那就是存在著一個週期性的『青銅器時代』」。⁽³⁰⁾這個青銅器時代包括殷周、西周以及列國期，前後歷時約一千年，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嫁女媵器大為增加，器形與紋飾一改過去意匠經營之風，而代以迅速、方便裝飾的風格，則維持彝器文化的

古代世界便已不復存在。³¹

瞭解白川靜對於青銅器、金文及該時代的看法後，可再從下列兩方面觀察本書寫作特色及其成就……

一、斷代與編年

白川靜特別重視金文斷代問題，認為首要工作是「確立器物的時代觀」，並指出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吳其昌《金文臚疏證》以及董作賓《西周年曆譜》皆因對器物的時代觀認識錯誤，而無法獲得完滿之結果。有鑑於此，本書第十二章「斷代與編年」即是談論金文斷代的重要性，白川靜認為根據金文資料的顯示，較有可能推定出共懿時期的年曆譜，至於昭穆以前的部分也可以推定出一個大體的年代。³²雖然如此強調金文斷代的重要與可能，但並未在本書提出其具體的斷代編年看法，而時至今日，學界對金文編年斷代的問題也未取得共識，甚至窮盡一國之力也未必能得出令人滿意之結果。³³因此白川靜對於斷代編年的強烈企圖，應視為反映1970年代日本漢學界先秦史研究的主要潮流，本文無意加以論斷，僅就本書較具特色的「休王問題」進行討論。

「休王問題」見於本書第三章，是白川靜根據《效父簋》「休王賜效父金三」而提出的見解。過往學者多將「休」字讀作動詞，未有視為王號者，但作者認為此解不合語法，且此器形制紋樣古樸，製作時間不會晚於成康期，加上孝、夷以前多見諸王王號，惟不見康王一人，因而主張「休王」為康王的生稱，後來才改稱康王，理由是其宮廟被稱為康宮。基於此立場，白川靜更將另外兩件見「休王」銘文的《邵鬲器》及《鬲

父方鼎》都視為康王時器。³⁴此論點之提出，雖使上述三器的所屬王世更為明確，但未被學者所接受，主要的原因在於1972年陝西扶風庄白所出的《史牆盤》有「淵哲康王」之說，此外2003年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迷盤》也見「會盥康王」，因此高山節也在談論西周國家的天命觀時，曾對「休王」問題提出回應，認為「根據後出的史牆盤來看，『休王』之休必然是修飾語。」³⁵至於中文學圈的學者亦不曾引用此說，唯有白冰視此說為作者成就，認為「『休王』究竟是不是『康王』生稱？看來還需要等待出土資料的驗證。但白川靜提出的是一個新的看法，見解有其獨到之處，給人以啟發，所以列入成就例。」³⁶

由於兩件見「康王」稱號的青銅器皆在白川靜提出說法後出土，故不宜從批判立場看待此結論，而應從其思路進行觀察。作者能在有限的資料下，對銘文解釋的語法加以檢討，同時結合歷史學討論的生稱說、康宮問題，以及器物的形制紋飾進行思考，姑且不論其說法是否可信，此種具系統性的綜合思考已為後世研究者示範了金文學研究的典型途徑，同時也體現撰著本書的主要目的。

二、以金文為主的西周史

在目前出版的兩周史論著中，大致可見三種書寫方式：其一是根據傳世文獻內容，並輔以出土文獻寫作而成，例如：楊寬《西周史》、許倬雲《西周史》³⁸；其二則是以金文資料為主，輔以傳世文獻建構者，即白川靜《金文的世界》³⁹；其三以考古材料為主，探討兩周社會及文化的變遷問題，例如：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0年的中國社會》⁴⁰。這些著作

隨研究方法不同而構築出形色各異的上古史，其中以楊寬《西周史》的寫作時間最早，然其歷時四十載，故論出版時間則以白川靜《金文的世界》為最早的兩周史著作。從撰述宗旨與方法看，《金文的世界》與《西周史》未見太大差別，然因前者涵納較多內容，因此也廓清了許多後者未論證完整的歷史課題。

例如依據本書第十一章「中興之挫折與崩潰」所示，作者利用「宣王中興」、「淮夷」、「玁狁」及「西周之崩潰」四個課題，勾勒出一幅外族入侵，氏族相互傾軋，政治秩序走向崩潰的歷史圖景，並反駁《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的傳說。白川靜認為：

其實，周末秩序的崩潰，在厲王、宣王的時代已然開始，《詩經》裡諷詠時事，可謂昭然若揭。及至幽末之亂，諸侯之不肯奉召勤王，乃是這個早已失去利用價值的王室終於到了被諸豪族遺棄的時候了。不然就是這些諸侯本身已自顧不暇，無力再給予庇護的結果吧！⁴⁰

由上可知，白川靜並不接受傳世文獻將西周滅亡歸咎於幽王末期政治喪亂的說法，而是認為周王朝政治秩序之崩潰醞釀已久，幽末之亂僅是反映王室對氏族支配權力的喪失，而此才是導致西周滅亡的主因。作者異於傳統的觀點，一方面是回應日本學界長期以來對殷周政權及其結構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帶動其他學者對此課題的挖掘與研究，其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跳脫了西周通史的寫作方式，運用考古材料、銘文及傳世文獻，針對西周衰弱

與滅亡這一歷史事件進行實證性研究。

此類利用金文材料翻轉傳統觀點的敘述手法，在《金文的世界》屢見不鮮，除對西周滅亡的原因抱持不同意見之外，尚包括質疑三監是否參與武庚象父之叛（參見頁35）、主張周朝之禮樂完備於昭穆時期而非周公（參見第四章）、主張共和時代為數位執政者先後擔當處理王政的職位，反對傳統周召二公共和或共伯和攝行王政之說（參見第九章）等等，均為習於傳世文獻解釋的讀者帶來全新看法。例如，周代禮樂部分特別著重青銅器上的鳳鳥紋，指出「鳳文是與祖靈觀念直接結合而有的。它的盛行，意味著新的禮樂時代已經到來。」⁴¹甚至認為「殷周銅器之文樣，如饗饗、虺龍等，主要把源自古老信仰的精靈觀念作為實現之宗旨而產生的……然至昭穆期，揚稱祖業的禮教思想流行起來，取代了先期的精靈觀念，因而以鳥形靈直接與祖靈結合的意義正好符合當時祭器之用的鳳文就大行其道了。」⁴²儘管學界對於青銅器紋飾與商周信仰之間的關係仍未有共識，不過白川靜將青銅器紋飾圖樣的遞嬗，視為周代禮樂思想流行之象徵，可說是相當新穎又不失理據的切入點。其為大眾讀者揭示一個重要概念，即閱讀歷史不應僅依靠文字所記載的各種內容，也需關注物質文化所呈現的訊息以及演變。

值得注意的是，白川靜雖試圖利用金文材料寫作兩周史，但也不諱言其不足之處。例如，面對內容簡略、結構單調的春秋金文，便指出「金文與一般傳承的資料不同，它是當時事情的記載，所以在資料上是最確實可信的。可惜此期不再像西周金文那樣以王廷為中心了，從歷史流程中汲取來的祇是局部性資料，對於時代全體的認知自難充分。」⁴³這段論述正提供了《金文的世界》另一個重要思考，亦即金文作為歷史研究材

料，其可能面對的侷限與困境為何。

綜觀而言，《金文的世界》比起建構一套嶄新的兩周歷史，似乎更著重教育讀者閱讀上古史的態度，除強調廣泛觀察與博通思考的重要性外，也主張應對既有知識採取批判性思維，而非一概盡信。因此，我們不該僅將《金文的世界》置於白川靜金文研究脈絡中審視，而應理解作者所處的時空環境背景以及撰著預設的讀者性質，思考以金文為新視野所建構出的殷周史，是否推動當時學術研究的進展以及回應作者最初所擬定的寫作宗旨。

肆、白川靜金文研究的影響與反思

若欲全面檢視白川靜的金文研究成果，必須先回到日本的先秦史研究脈絡，並思考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白川靜的研究可以擺放在什麼位置？1951年，日本甲骨學會發行的《甲骨學》研究集刊，帶動了日本學界對殷周史的關注及研究。《甲骨學》是結合當時全日本文、史、哲學界關心殷周史的研究者所發行，1961年改為隔年刊行，而1964年10月號發刊以後便永久休刊。不過在休刊前不久，日本的殷代史研究也發展到高潮階段，其後研究者的關心便轉向西周史。^[4]這部發行於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期刊，為日本學界的殷周史研究揭開了序幕，而白川靜不僅是日本甲骨學會的一員，也曾於《甲骨學》發表過兩篇重要文章。^[5]

一、白川靜金文研究的位置及影響

日本學界對於殷周史的關心，主要集中在於國家型態方面的思考。其研究途徑有二：一者是探討從氏族制社會到都市國家，再經過領土國家

直到秦漢帝國的形成過程；另一者則是將先秦時代視為秦漢帝國的前史，思考氏族制社會及其崩解的原因。前者的思考途徑，使日本學者對殷、周各自的國家結構，以及殷周關係等課題展開長期且深入的論辯，而白川靜也對此提出過一些看法，進而影響其著作觀點。

白川靜首先關注「殷周關係的連續性問題」，這也是由於當時日本學界正在回應王國維1917年所提出的〈殷周制度論〉。王國維於文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又認為「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更從立子立嫡制、廟數制及同姓不婚制三者，強調殷、周兩代國家制度之差異。^[6]但是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卻通過對殷周王位繼承法的檢討，主張殷周之間未從存在如此強烈的差異，並傾向將商周兩代視為一個連續性的整體。^[7]基本上，白川靜抱持和貝塚氏同樣的觀點，且格外關注殷周關係的連續性問題，因此其對於周王朝初期的統治、殷遺民問題或是被視為殷代召方後代的召公家族，都曾寫過專文討論。^[8]當然，白川靜並不否認殷周之間的差異性，其後松丸道雄也提出重新思考王國維之說的可能性。^[9]不過在這個階段，日本學界對於殷周關係投入較多關注，而白川靜對於殷周關係的立場，使其不僅特別關心殷遺民的動向，也進一步研究殷代國家結構。

江村治樹認為日本戰後最早試圖闡明殷代國家構造的學者就是白川靜。其主要利用金文的圖像記號，針對殷代結構中的真人集團、多子集團、多子族集團、多亞集團等，以及各氏族、部族內的職能集團進行研究，並根據金文及甲骨文指明殷代國家是由氏族、部族性質的集團發展而成，因此其任何統治手法都很難視為殷代制度面的特點。^[10]同一時期稍晚，伊藤道治的《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

研究》也涉及這方面問題，其研究祭祀卜辭的內容，藉以論證殷代王權的確立，來自於祖先崇拜的成立。⁽³³⁾ 其後又如赤塚忠也主張殷王朝是通過祭祀手段，間接地將周邊諸侯統合起來。⁽³⁴⁾ 上述這些研究，都應視為日本學界1960年代的成果，其後隨著《甲骨學》的停刊，殷代國家結構的研究沉寂了好一陣子，直到松丸道雄發表《殷周國家の構造》一文，日本才再度展開另一場不同角度的討論。⁽³⁵⁾

儘管白川靜在殷周史研究方面做過部分開創性工作，但從影響層面來看，似乎不及貝塚茂樹、松丸道雄等人。相較之下，白川靜仍是以甲骨、金文考釋文字方面的成就最為人所知。尤其是其《金文通釋》不僅處理了當時所見絕大多數的金文考釋，同時還包含金文的歷史、研究方法、利用金文重構西周史、文字索引等課題，江村治樹更稱之為「殷周金文的總書」。⁽³⁶⁾

正因如此，日本研究殷周史的學術著作無不引用白川靜《金文通釋》。例如·吉本道雅在分析西周冊命銘文中代表器主職務更新的語彙「鬻」字時，就採用了白川靜「繼續、增益」的訓釋，並表示「在這些用例上，作為申的訓詁仍然有效」，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鬻」所代表的具體升遷情況。⁽³⁷⁾ 又如，松井嘉德討論周代國制時，引用大量銅器銘文，不少解釋也都遵從白川靜《金文通釋》的看法。⁽³⁸⁾ 甚至如沈培在今年發表的〈釋甲金文中的「逐」——兼論上古音魚月通轉的證據問題〉也指出「最早主張甲金文的「逐」一字有「迎接」意的學者就是白川靜，可惜後來學者對其說沒有足夠認識，以致於耗費許多時間才正確釋讀出此字」。⁽³⁹⁾ 由於白川靜的考釋文字受到民俗學影響甚深，因此過往學者多採取批判態度，指陳其釋字錯誤之處。然而而不可否認，《金文通釋》

仍是日本至今最為完備的金文集釋著作，其不僅代表白川靜個人研究成果或考釋觀點，同時也是諸多日本學者賴以研究殷周史的基石，若從這個角度來看，白川靜的金文研究仍占據一席相當醒目的位置。

二、白川靜金文研究的批評與反省

儘管白川靜《金文通釋》得到許多日本學者的引用與認可，但并不代表沒有批評的聲音。白川靜在日本漢學界最著名的一場論戰，是與東京大學教授藤堂明保（1914—1985）針對漢字起源的爭辯。

1970年，白川靜於岩波書店出版針對一般大眾的新書《漢字—生成與背景》，並提出頗具爭議性的獨創觀點。《漢字—生成與背景》一書共六章，包括「象形文字之論理」、「神話與咒術」、「神聖王朝的構造」、「秩序的原理」、「社會和生活」及「人的一生」，而白川靜也於書中表明「研究漢字的起源，首先必須依靠甲骨、金文，把握其最正確的初形。欲了解字形的意義，則不得不從當時的觀念及思維方法去理解」。⁽⁴⁰⁾ 儘管確實是認識漢字的理想途徑，不過白川靜推想中國古代是個充滿巫術與咒術的世界，因而往往從巫祝角度解釋文字。例如，其認為甲骨、金文中的「口」形是「載」字初文，「載」讀音同於日語之「サイ」，指祝告之器，而內中盛放古代祝告及盟誓的載書。基於此觀點，白川靜對甲骨、金文的从「口」之字有著異於過往的詮釋，不僅認為含有「口」、「日」、「音」、「言」等形的文字都與載書有關，甚至如「君」、「命」、「若」、「告」、「兄」、「史」等字也朝祝告的方向解釋。⁽⁴¹⁾

白川靜解釋漢字起源的方式，令藤堂明保感到極為不滿，並於岩波書店發行的雜誌《文學》撰文批判。藤堂氏主張研究漢字必須重視聲符，

語言的本質是「聲音和特定意義有所連結」，不宜隨意訴諸表象視覺的猜測，同時批判白川靜結合民俗學、宗教學以詮釋文字的途徑，認為這使文字的理解更加複雜，完全本末倒置。要言之，藤堂明保認為《漢字—生成與起源》的內容和標題是「完全不適合」，「若是當作一本中國文化史來閱讀的話，倒是很有趣」⁽⁶²⁾。除藤堂明保以外，同時期的加藤常賢也不認同此書，批評白川靜「為什麼不讀一下《說文解字》」、「沒有根據的事情，就不要說」⁽⁶³⁾。針對兩位學者的批評，白川靜也曾撰文回應，除表現對藤堂明保「單語家族」研究的不認同外，也再次表明自己是「掌握了古代社會及古代文化中的古文字」⁽⁶⁴⁾。

這類爭論更具體展現在三家對於文字解釋的看法差異上，例如，「方」在《說文》解釋為「併船也」，藤堂氏及加藤氏說解漢字時皆未採用此說，而是遵從徐中舒「農具之形」的看法⁽⁶⁵⁾，然白川靜卻認為「方」是指將人的屍體架起，若對屍體加以毆擊，就是稱為「放」⁽⁶⁶⁾。從現今的眼光來看，三家說法都不完全正確，然白川靜的說法確實異於一般理解，尤其從筆法而論，很少人將「𠄎」（方）的下部與「𠄎」（人）視為同一形體，相較之下，加藤常賢與藤堂明保的看法仍是較有根據。不過，隨著加藤常賢、藤堂明保的逝世，反對白川靜的聲音逐漸消失，加上其大量出版面向一般大眾的普及讀物，影響力大為上升，90年代後期日本社會更出現所謂的「白川靜風潮」⁽⁶⁷⁾。

除日本方面的學者曾對白川靜的古文字研究有不同聲音外，中國方面也對其金文研究或古文字研究做過檢討。例如，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同時評論白川靜金文研究的成就與疏失，整理出至少40器銘文，指出《金文的世界》存在釋字斷句、人名、地名以及引用古籍的錯誤⁽⁶⁸⁾。

或者根據《字統》分門別類，對白川靜考釋過的文字依序進行檢討⁽⁶⁹⁾。大抵說來，白冰多持正面論述，即便面臨白川靜難以迴避的釋字問題，也多視為「特色」、「新見」或「獨到之處」，少有嚴厲批判，不過部分的批判論述，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例如·在《金文世界》的疏失一節中，白冰多引用馬承源、唐蘭的研究成果印證書中錯誤，然《金文的世界》一書出版於1971年，而馬承源《商周青銅銘文選》最早出版於1988年，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亦於1986年出版，儘管作者表明這些評論「目的只想給一般讀者閱讀《金文世界》時以參考，同時也為使這部金文著作本身更加完善一些，絕無任何挑刺之意」⁽⁷⁰⁾。然若以「疏失」論之，似乎頗有以今度古之嫌，或許將此視為對《金文的世界》的「補正」較為妥當。

相較之下，劉海宇對白川靜研究成果的批判力道則更為強烈。其《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一文，除介紹白川靜著作，分析文字理論特色、方法外，也對其古文字研究提出三點批評：首先，作者認為白川靜將「文字符號圖像化理解導致會意字的範圍過於廣泛，把一些非常簡單的形聲字解釋為複雜的會意字」⁽⁷¹⁾。通過文字聲音相互通假以考釋文字，一直是域外學者較難掌握的方法。白川靜考釋文字也盡可能不隨意使用假借，而結果往往使字形分析變得更为複雜，忽略了假借與形聲字在漢字演變脈絡中的重要性，這也是藤堂明保批判白川靜最為用力之處。其次，指出白川靜對區別性符號的認識不足，無法覺察「口」形有時僅是與字義無關的裝飾符號，導致詮釋從「口」形之系列字時出現自相矛盾的解釋。最後批評白川靜從民族學的材料與觀點分析文字，認為

大多數的風俗習慣已於歷史發展過程中消失，若以民俗學角度切入，容易牽強附會，產生臆說。²²⁾

實際上，從藤堂明保到劉海宇的各種評論，都可以視為和白川靜研究成果的對話，他們所指陳的問題，確實是閱讀這些金文著作需特別注意之處。不過，從白川靜著述的內容來看，其並非如藤堂氏等人所指稱，完全不理解音韻在漢字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例如，其於《漢字百話》一書中，除了表明分析同音系文字時，也需關照形、義的重要，同時也對藤堂明保的「詞彙家族」加以批評。例如，藤堂氏認為「土、事、史」三字的基本含義是「站立」，但白川靜不同意其說，指出「土」土表示身分的器物，象鉞的刃部朝下。至於「史」、「事」則與祭祀神明有關，與「立」字沒有任何關聯。²³⁾儘管白川靜對於字形的解釋也較特出，但指出「土、事、史」與「站立」無關，確實十分正確的。要言之，儘管諸家批評並非無的放矢，不過若分別就其學說檢視參照，也存在許多缺陷和遺憾之處，因此相較於檢討疏失或錯誤，理解不同學者所採取的研究途徑或目的，或許是更好地理解這些著述的方式。

對白川靜而言，研究古文字的意義，除了認識文字最初形態、了解形、音、義之外，還因古文字反映了古代思維觀念、生活習俗，提供社會文化史、思想史、技術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此外，白川靜也擔憂日本社會所逐漸浮現的漢字閱讀問題，認為將對文化的傳承產生重大影響，因而試圖提出讓大眾更容易親近漢字的方法。²⁴⁾不難發現，白川靜認為理解文字的本形本義，乃是為了研究古代思想及文化，而更進一步言，認識漢字之目的是欲回應日本作為漢字社會的傳承與發展。從這個角度而言，或許更能持平地理解其金文研究的方法，若我們能同理白川靜所

處的時代背景及終極關懷，或許值得重新思考其金文研究對日本漢學界，乃至於古文字學界產生什麼影響。

伍、結語

以上本文回顧了白川靜的金文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其《金文通釋》不僅總結了前輩的成績，同時也對日本漢學界具有開創性意義。上文已經陸續提及白川靜其他古文字方面的研究，以下，將再提出一些有待研究的議題：

首先，前文論及白川靜對殷周關係以及殷國家結構方面的研究，有開創之功，這無疑與他的甲骨文研究有密切關聯。有鑑於此，僅僅檢討金文研究成果，並無法全面突顯白川靜在古文字和上古史方面的貢獻，尤其是古文字以外的古代文化研究，目前沒有相對足夠的理解，這相對會影響到我們對白川靜研究成果的整體認識。

白川靜研究多侷限在金文或古文字的原因，可能是囿於研究者的學習領域以及史料問題。過往白川靜的甲骨文研究較為零散，加上甲骨文殷商史已形成極為專業的甲骨學，故研究者往往需要具備相對知識，才能做進一步評判。近年來，東京平凡社已出版《白川靜著作集》，完整蒐集學者所需要的材料，因此對白川靜甲骨文及殷商史研究的回顧，已是適合展開的研究課題。

其次，民俗學觀點是白川靜研究中的重要特色，無論是《詩經》或是古文字學研究，都可見其運用痕跡，而過去學者對此多持批判態度。雖然從糾謬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向並無不可，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白川靜所處時代的重要性，民俗學角度未必是穿鑿附會地解釋古文字，有

時也提供另一種跨文化的視野。林耀濤的研究表明，白川靜所開拓的民俗學研究進路，固然無法詮釋全部的《詩經》詩篇，但其研究視角作為一種新方法論，對《詩經》的整體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³⁾同理，民俗學觀點固然也難以釋讀古文字的初形本義，但此種分析角度，卻是極具特色的一種途徑，對理解白川靜研究中國古文字及古代史，是不容輕易忽視的。

最後是比較的問題。目前學者在研究白川靜的古文字學時，多半與其他古文字學者的著作相互參照，再分析其研究特色或說法優劣，這樣的比較雖然十分具有價值，但我們似乎更應該注意到其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以及關懷議題。如同白川靜自己在《孔子》一書的〈後記〉表明，「對於問題的意識是因入而異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只不過，在所謂的『讀書千卷，冷生涯』的研究者的生活當中，也有不顯現在外的心思。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也會有某種現實與其意識底層相連。沒有這個現實的話，是很難在研究中投入熱情的。」⁽⁴⁾

因此，我們目前需要的已經不是再次從糾謬角度，評判日本漢學家研究成果，而是具有問題意識地，分析或同理其觀點，相信以此作為開展，將會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 本文的撰成蒙張寶三老師的鼓勵，劉柏正同學對行文風格的指導，勞悅強老師於2017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評，以及廖肇亨、萩原正樹、芳村弘道以及《紀要》編輯部等老師的建議，特致謝忱。

* *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及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1) 李學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展望》，《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36。

(2) 白川靜《詩經》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參見林耀濤：《葛蘭言、白川靜《詩經》

民俗學研究論述》，《成大中文學報》2007年第十七期，頁43—78。

(3) 白冰：《青銅器銘文—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頁13。

(4) 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與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頁59—64。蘇冰：《白川靜漢字字源學一瞥》，《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頁94—96。

(5) 臺灣翻譯出版白川靜的著作包括：蔡哲茂、溫天河譯《甲骨文的世界》（台北：远流圖書公司，1977年初版）。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初版）。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年初版）。鄭威譯：《漢字百話》（台北：大家出版社，2012年初版）。學術論文方面，臺灣未見以白川靜及其研究為題的學位論文，單篇文章部分除上文引用林耀濤論文外，僅有傅錫壬：《白川靜的《中國神話》》，《國文天地》第十四期（1986年），頁82—83。王孝廉：《關於白川靜《中國神話》的中文翻譯》，敬答傅錫壬先生，《國文天地》第十六期（1986年），頁45—47。二者皆非學術論文，亦與文字學研究無關。

(6) 臺灣關於白川靜文字學研究的單篇論文，見張宇衛：《台灣における白川文字學の受容の過去と現在》，《立命館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紀要》2017年第10期，頁9—24。該文全面爬梳1960年代至今臺灣學界對白川靜文字學的接受與影響，是目前最具系統性的學術回顧論文。

(7)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一》（東京：平凡社，2004年），頁3。

(8)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五》（東京：平凡社，2004年），頁179—233。

(9)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五》，頁211。

(10)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五》，頁227。

(11) 絕對年代標誌法是青銅器斷代的著名方法之一。主要方式是找出能斷定具有明確年、月、日、以及提及時王祭祀其父、祖的明確銘文，或是選擇一批內容彼此有關聯的青銅器，把記載的事件和人名作為紐帶連結成或大或小的群體，這個群體中至少有一個具備絕對年代的標準器。這個斷代方法的問題在於具有理想條件的青銅器數量很少，而且時至今日，學界對於西周曆法仍未有十分切確的共識。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17—21。

(12)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五》，頁280。

(13)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卷五》，頁279。

- (14) 引文為筆者翻譯，原文參見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六》（東京：平凡社，2004年），頁4。
- (15)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六》，頁16—25。
- (16)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六》，頁26—36。
- (17) 白冰列舉15個字例對《金文通釋》的文字考釋進行分析和述評，其中多引用後來出土文獻或其他學者說法，以對白川靜的論點進行糾謬。詳見白冰：《青銅器銘文—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頁21—34。
- (18)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一（下）》，頁462。
- (19) 裘錫圭：《釋「建」》，《裘錫圭主編文集 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9—42。
- (20)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一（下）》，頁492—494。
- (21) 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譯者自序》，《詩經的世界》（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年），頁3。
- (22)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62。
- (23)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106。
- (24)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卷一（上）》，頁181。
- (25)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頁246。
- (26)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3。
- (27)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11。
- (28)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11。
- (29)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12。
- (30)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2。
- (31)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10。
- (32)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239。
- (33) 1996年至2000年間，中國結合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執行「夏商周斷代工程」計畫，其目標乃為「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但2000年發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卻遭多方學者批評。尤其在《簡本》發表後的十多年間，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及銘文不斷為西周年代學提供關鍵性證據，也證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代框架不但含有某些問題，更可能從頭到尾全部都錯。相關批判意見可參夏含夷：《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出土材料與新視野》（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342—379。
- (34)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61—63。
- (35) 高山節也：《西周國家「天命」的機能》，《西周とその國家》，頁383。
- (36)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頁64—65。
- (37) 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 (38)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 (39)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hicago: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6). 中譯本，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著，吳長青、張莉、彭鵬譯：《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40)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205。
- (41)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73。
- (42)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81。
- (43) 白川靜著，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頁208。
- (44)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1993年116號，頁44。
- (45) 白川靜在《甲骨學》發表的文章分別為《釋南》，《甲骨學》1941年第三號，頁1—33。《蔑曆解》，《甲骨學》1943年第四、五號，頁89—104。
- (46)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1993年116號，頁44。
- (47)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87—303。
- (48) 貝塚茂樹：《卜辭を通じて見た中国の古代国家》，《貝塚茂樹著作集 第二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頁55—94。
- (49) 白川靜：《西周史略 第一章殷周之際》，《金文通釋6》，頁1—25。《召方考》，《甲骨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1973年初版，1996年再版），頁171—203。
- (50) 松丸道雄：《殷周國家的構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四 古代》（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49—100。
- (51) 白川靜所謂的「圖像記號」又稱族徽銘文。張懋鎔指出，關於這類特殊銘文，學界有多種稱謂，包括象形字、圖形文字、文字畫、族徽文字、早期銅器銘文、徽號文字、族名文字、記名銘文、族氏銘文、族氏文字、族氏記號、家族記號等等。參見《二千年來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3—22。
- (52)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1993年116號，頁48。
- (53) 伊藤道治著，江藍生譯：《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

- 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 頁101—105。
- (54) 赤塚忠·《中國の古代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東京·角川書店, 1977年)。
- (55) 松井嘉德指出戰後日本殷周史研究, 存在都市國家論和邑制國家論兩大主要潮流, 前者以宮崎市定、貝塚茂樹為代表, 後者以宇都宮清吉、松丸道雄的論述最著名, 此後日本殷周方面的研究便圍繞著國家型態的問題展開論述, 參見松井嘉德·《周的國制—以封建制與官制為中心》, 《殷周秦漢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 頁70—87。
- (56)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 《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 1993年116號, 頁48。
- (57) 吉本道雅·《中國先秦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2005年), 頁41。
- (58) 松井嘉德·《周代國制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2002年)。
- (59) 沈培·《釋甲金文中的「迓」兼論上古音魚月通轉的證據問題》, 《上古音與古文字研究的整合》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香港·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際學院主辦, 2017年7月15—17日)。
- (60) 白川靜·《漢字—生い立ちとその背景》(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 頁21。
- (61) 關於白川靜的載書系列字研究, 可參見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及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年)。
- (62) 藤堂明保·《白川靜著「漢字—生い立ちとその背景」》, 《文學》1970年7月号(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 頁106—112。
- (63)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とその問題点》, 《神戸大学大学院人間発達環境研究科研究記要》第6卷第1號(2012年), 頁42。
- (64) 白川靜·《文字学の方法》, 《文学》1970年9月号(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 頁99—110。
- (65)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とその問題点》, 《神戸大学大学院人間発達環境研究科研究記要》, 頁39。
- (66) 白川靜·《漢字百話》(臺北·大家出版, 2012年), 頁83。
- (67)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とその問題点》, 《神戸大学大学院人間発達環境研究科研究記要》, 頁37—45。
- (68)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 頁76。
- (69)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 頁165—232。
- (70) 白冰·《青銅器銘文研究—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 頁57。
- (71)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 《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 頁59—64。
- (72)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 《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 頁59—64。
- (73) 白川靜·《漢字百話》, 頁189。
- (74)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雜纂》, 頁24—25。
- (75) 林耀濂·葛蘭言、白川靜《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 《成大中文學報》2007年第十七期, 頁77。
- (76) 白川靜著, 韓文譯·《孔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頁223—224。

參考文獻

- 一、今人論著
- 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白冰·《青銅器銘文—白川靜金文學著作的成就與疏失》(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7年)。
- 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東京·平凡社, 2004年)。
- 白川靜·《漢字—生い立ちとその背景》(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
- 白川靜著, 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001年)。
- 白川靜著, 鄭威譯·《漢字百話》(臺北·大家出版社, 2012年初版)。
- 白川靜著, 韓文譯·《孔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 伊藤道治著, 江藍生譯·《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
- 吉本道雅·《中國先秦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2005年)。
- 佐竹靖彥等·《殷周秦漢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
- 李學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展望》, 《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年)。
- 赤塚忠·《中國の古代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東京·角川書店, 1977年)。
- 松井嘉德·《周代國制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2002年)。
- 張懋鎔·《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年)。
-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3年)。
- 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9年)。
- 蔡哲茂·《溫河譯·甲骨文的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77年初版)。
- 蔡哲茂·《溫河譯·金文的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9年初版)。
- 羅泰 (Lothar) 著, 吳長青、張莉、彭鵬譯·《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

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二、單篇論文

田畑曉生·〈白川靜ブームとその問題点〉,《神戸大学大学院人間発達環境研究科研究記要》第6卷第1號(2012年),頁37-45。

白川靜·〈文字学の方法〉,《文学》1970年9月号(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頁99-110。

江村治樹·〈日本における先秦史の研究動向と課題〉,《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1993年116號,頁43-56。

沈培·〈釋甲金文中的「逐」——兼論上古音魚月通轉的證據問題〉,《上古音與古文字研究的整合》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香港·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主辦, 2017年7月15-17日)。

貝塚茂樹·〈卜辭を通じて見た中国の古代国家〉,《貝塚茂樹著作集 第二卷》(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7年),頁55-94。

松丸道雄·〈殷周國家的構造〉,《岩波講座·世界歴史·四·古代》(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頁49-100。

林耀澐·〈葛蘭言、白川靜《詩經》民俗學研究論述〉,《成大中文學報》2007年第17期,頁43-78。

夏含夷·〈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出土材料與新視野》(臺北·中央研究院, 2013年),頁342-379。

裘錫圭·〈釋「建」〉,《裘錫圭學術文集 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頁39-42。

劉海宇·〈日本漢學家白川靜及其文字學思想〉,《語言文字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頁59-64。

藤堂明保·〈白川靜著「漢字——生い立ちとその背景」〉,《文学》1970年7月号(東京·岩波書店, 1970年),頁106-112。

蘇冰·〈白川靜漢字源學一瞥〉,《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頁94-96。

參、學位論文

劉海宇·〈白川靜《字統》「載書」文字學的譯介及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年)。

(台灣佛光大學助理教授)

